



彭林祥

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商务印书馆与上万名作者有过合作,为众多文人学者提供了著书立说的机会,令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加入了写作行列,成为20世纪中国文人学者的“孵化器”。语言学家王力是十分幸运的一位,1928至1949年间,他在商务印书馆的支持下不但顺利在法国拿到了博士学位,还成为著名的文学翻译家、语言学家。

1927年夏,王力从清华国学院研究生毕业。在导师赵元任的建议和推荐下,27岁的王力踏上了开往法国的轮船,开始在巴黎大学学习实验语音学。由于是自费留学,加之无殷实的家底,父母的供给能力有限,在巴黎的王力首先就面临生存问题。就在他为经济发愁的时候,他在法国遇到了来欧洲作学术考察的老师李石岑。由于李石岑不通法语,最初三月还跟王力学法语,在学习期间,李石岑了解到王力在法留学的经济困境,他决定给予王力一些帮助。由于他是《民铎》的主编,此时正与商务印书馆合作主持《民铎丛书》的出版,于是他决定把王力研究生期间撰写的《老子研究》纳入《民铎丛书》,1928年6月,纳入民铎丛书之四的《老子研究》由商务印书馆推出。这是王力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全书着重对《老子》一书的叙述和阐释,博采众说,纠正了某些曲解,力图做到从《老子》的著作本身求得《老子》的真意。但作者毕竟年轻,学

识积累稍显不足,所以他在《后记》中曾如实地坦白了本书的缺点:“是篇但作整理功夫,至于批评则有所待也,他日储识稍富,容或继今言之。”更重要的是,商务的稿费及时地让留法的王力在经济上获得了大地的缓解。

正因为这次买稿换钱经历,给正在留学的王力指明了一条勤工俭学之路。稍后,他又在老师李石岑的建议下,利用业余时间开始进行文学翻译,希图以此赚取稿费。最先问世的作品是1928年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挪威作家安达西夫人(又译温琪琪夫人)的小说《贫之初遇》,1928年11月23日译毕,后经李石岑推荐给时任《小说月报》编辑的叶圣陶,叶圣陶看了王力的译文,颇为欣赏并回信给予鼓励:“信达二字,钩不敢言,雅之一字,实无遗憾。”两个多月后,译文刊于《小说月报》第20卷第2期,稿费也很快寄到王力手中。受此鼓励,王力的翻译热情大增,他的译作源源不断地问世。由于与商务已有了愉快的合作经历,王力自然首选把稿件交给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对于王力的译稿,基本上是来稿必收,鉴于王力是自费留学,商务印书馆有时甚至还预支稿费。不过王力当时还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译者,商务的稿酬大约是每千字1-2元,但由于他翻译的数量多(总字数达200万字),稿费的数量也非常可观。应该说,王力正是依靠商务印书馆提供的大笔稿酬,使他能够支付留法费用,并顺利在1932年拿到博士学位。



1930年在法国时的王力

由于与商务有了长期的往来,王力在清华任教期间,商务印书馆还主动邀请王力译稿、写稿。“二十二年秋,以事过沪,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嘱为《万有文库·百科小丛书》编著《希腊文学》《罗马文学》《伦理学》《巴士特》四书。”王力接受了王云五的邀请,回到清华大学后,利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很快完成了《希腊文学》《罗马文学》和《伦理学》,三书纳入《万有文库》之《百科小丛书》并于当年12月出版。由于王力对化学和医学知识比较欠缺,不敢冒昧为法国生物学家、化学家和微生物学的奠基人巴士特作传。于是,他邀请他的清华同学孙逸一起合作,《巴士特传》最后于1933年11月初完成。该书后纳入《万有文库》之《自然科学小丛书》,于1935年3月初版问世。尽管王力在法国留学期间翻

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商务印书馆接受了译稿后并未马上着手出版,加之1932年商务又遭受“一·二八”之祸,总管理处、总厂及编译所、东方图书馆、高小小学被炸焚毁,损失巨大,被迫停业,解雇全部职工,直至当年八月才复业。王力的译作出版时间自然也受影响。在1934年前,商务为王力只出版了《半上流社会》(小说,小仲马著,1931年6月初版)和《小芳黛》(剧本,乔治·桑著,1933年12月初版)两部译作。1934年可谓是王力译稿的出版年,商务印书馆在这一年内竟然出版了王力的12部译作。具体出版时间如下:1月,《娜娜》(小说,上下册,左拉著);3月,《屠槌》(小说,上下册,左拉著)和《讨厌的社会》(剧本,巴越浪著);4月,《我的妻》(剧本,嘉禾著)、《恋爱的妇人》(剧本,博多里欧著)、《佃户的女儿》(剧本,埃尔克曼、夏特里安著)、《沙菲》(剧本,杜德、贝洛著)和《婚礼进行曲》(剧本,巴达一著);5月,《伯了贵侯爵》(剧本,费复旦著)、《卖糖小女》(剧本,嘉禾著)和《爱》(剧本,查尔第著);9月,《生意经》(剧本,米尔波著)。1935年3月,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王力的社会学译作《社会分工作》(涂尔干著);此外,据王力回忆,他还“有几部稿子在日本侵略军放火烧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时候被烧毁了,记得其中有傅马舍的《塞维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结婚》。”据笔者统计,王力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作(不包括发表在《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的单篇译作)共17

种,超过商务的译者梁实秋(14种)、郑振铎(12种)和严复(10种)的译书数量。也正因为商务印书馆推出王力如此多译作,他也因此成为三十年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学者吴宏聪就曾回忆了自己认识王力的过程:“王力先生是我的业师。我在中学念书的时候,读过几本地他翻译的法国小说和戏剧,以为他是一位文学家。”(吴宏聪《怀念王力先生》,《中国教育报》2000年8月8日)

经过1934年的译作出版高峰后,王力的文学翻译活动急剧刹车。而原因与王力首次升任教授受控密切相关,这件事使王力认识到文学翻译终究只是自己的副业,而语言学研究才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自己从事文学翻译尽管有商务印书馆的大力支持并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但却荒废了自己的主业。所以,他很快停止了文学翻译,转而发愤研究汉语语法。1934年之后,作为翻译家的王力逐渐隐去,而作为语言学家的王力逐渐凸显。而作为学者,学术著作也需要有崇高的地位,王力自然很乐意把自己的著作交给商务出版。尽管王力所从事的语言学研究和者甚寡,其学术著作的读者数量有限,这些著作的出版并不能给商务带来大量的盈利,但是商务还是本着“开启明智、昌明教育、普及知识、传播文化、扶助学术”的宗旨为王力的语言学著作提供了持续不

断的支持。查阅《王力先生著述目录》(张双棣整理,夏蔚霞、唐作藩补订)可知,在三四十年代期间,王力的学术著作大多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具体如下:1936年,《中国音韵学》;1939年,《中国语文概论》;1940年,《中国文字学初探》和《汉字改革》;1943-1944年,《中国现代语法》(上下册);1944-1945年,《中国语法理论》(上下册)。可见,王力在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过程中,商务印书馆可谓是幕后推手。

1949年后,原商务印书馆由上海迁往北京。1958年,商务印书馆根据国家出版方针的规定调整了自己的出版范围,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与民国时期王力的大部分著作由商务出版相比,解放后王力的学术著作大多改由中华书局出版,但商务印书馆还是出版了他的《音韵学初步》(1981年)、《同源字典》(1982)等部分著作。1987年,王力去世。如果从1928年算起,王力与商务的关系持续了近60年,几乎伴随了王力整个学术生涯,这在商务与作者的关系史上也极为罕见。至今,商务印书馆还在不断出版王力的著作。作家冰心在《我与商务印书馆》中曾如此表达对商务的感情:“在这将近一个世纪中,我的作品也在几个别的出版社发表过,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商务印书馆是我最初的、永志不忘的良师益友。”王力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也可作如是观。

高梦旦:承前启后的“老商务”中流砥柱

散木

胡适晚年与秘书胡颂平说起旧时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先生,他从前还写过《高梦旦先生小传》。文章是因一事所发,胡适写道:“高的爱女因盲肠炎手术失误而致死,这位老人却没有一句埋怨的话。”胡适说:“高先生的为人,最慈祥,最热心,他那古板的外貌里,藏着一颗最仁爱温暖的心。”其实,庶几胡适自己也是这样的人,他们可以互相砥砺。

在胡适身边工作一年多后,胡颂平体验到胡适做人的道理,有一次他对胡适说:“我读《论语》在先生身上得到了验证。”胡适听了这话后慢慢说:“这大概是我多读《论语》的影响。”不过,在胡适眼中,有位朋友比他更有资格当“圣人”,这就是曾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高梦旦。

胡适曾说:“凡受过这个世界的新的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那么,他们是些什么人呢?胡适曾以九人为例,认为他们的人格可以称得上是“圣贤”,其中,名列第一位的,是高梦旦,其余则是张元济、蔡元培、吴稚晖、张伯苓、周作人、李四光、翁文灏、姜蒋佐。这九人,几乎都是文化人,而且都有丰盛的事功。其中的高梦旦,不仅是事功的丰盛,还有他身上折射出来的仁薄光辉,让人难以忘怀,而论其事功,则多是在他对商务印书馆的贡献上。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最初规模很小,只是一个多人合伙经营的小型印刷工场,之所以取名商务印书馆,是因为印书馆当时的主要业务就是印刷一些商务用途的簿册账本。到了1901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业务也得到拓展,最关键的是有一批学者开始进入商务印书馆,其中最著名的是张元济,他不仅以资金投入,而且主持馆内的编译工作。此后,商务印书馆的机构不断健全,至1903年又建立了印刷所、编译所和发行所,同时改为中日合办,引进了日本先进的印刷技术。再到翌年,又编印了《最新国文教科书》,一时风行全国,此后又陆续编印修身、算术、史地、英语等教科书,同时兴办师范讲习班、附属小学、养正幼稚园及函授学校,至于出版各种中外文书、刊物和学术著作等,更是其专擅。至1909年,商务印书馆将收藏古籍善本和参考书籍的图书馆定名为“涵芬楼”,后改名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又至1914年初,该馆毅然清退日方股份,自身获得了清誉,成为国内最大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其全盛时期在北京、香港等地都设有印刷分厂,并先后在全国各地和新加坡、吉隆坡等83个地方设立了分馆。一家原本只是印刷账本、簿册的小型印刷所,所以能在短短数十年间发展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出版集团,这与其先后主政的三人有着重要关系,即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其中高梦旦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

高梦旦成为“商务”的台柱之一,其在编译所最盛时下设20多个部,职工多达数百人,俨然是国内规模最完备、影响最大的一个编译单位;其又曾主持国文部,编辑小学国文等教科书,以期完成其夙愿,而兹事颇繁,所谓编译前定原则,确定各课难度、字数以及所涉生活、社会等各占比例,再着手组织人马编写,随即又采用合议制议原则,由编写诸君各提建议,经辩论后始成立宗旨;而文人积习,凡著文字,不愿他人增损一字,高梦旦则以一人识力有限,必欲矫之,主张编写者互相批改,以求圆满,而每册稿成,又征求知友批评,可谓百般精细,如此则质量得到保证,第一册印成后,仅三天即售罄再版,于是继出下、

续各册并编写其余各科等,而从此中国方有比较科学的小学课本矣。

如上所述,高梦旦早年浏览译籍,经常因为一二难解的术语而废读,由是他深感辞书出版的必要,遂加入“商务”之后,屡以为言。1908年,他与陆尔奎言及辞书的编写和出版,相谈甚洽,遂建议张元济邀请陆氏主其事,这就是由40余人之力、历时8年而成的中国现代辞书的开端——《辞源》的编纂和出版。如此之例,足见高梦旦之于“商务”是能断大事、虑无不中的,此后到了辛亥之后,商务印书馆日益扩充,张元济因主持全局,高梦旦以国文部长兼任编译所所长,由此又10余年,无论是图书选题的切合社会需要,还是书局经营有方(断无积压等损失),以及书局每成一书,并算出定价,此精确程度确是无能匹,彰显出他思维周密、做事稳妥的特点,而“商务”总公司凡遇重大决断及进退,皆须听取其意见,张元济更是视之如左右手,人称高梦旦为其“参谋长”,并非虚言。但高梦旦不以自骄,他性方行圆,又严于律己,待人诚恳,在“商务”历史上他是具有最高威望的长者之一,而“商务”高层管理者中,大凡出身、经历、性格等均不相同,甚至性格格格不入者,高梦旦则经常折冲其间,使“商务”30余年经营和管理者之中并无大的冲突,人又称之为“商务”不可少之“润滑剂”。这一例可以说明:1920年,高梦旦往北平游说胡适加盟,其时因“商务”巨额游资的投资流向问题,经理张元济与总经理鲍咸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因高梦旦外出而无人折中,张元济愤而辞职;待高梦旦回馆,他与陈叔通联手相劝,双方矛盾方得冰释。另一例更有意思:一次,职员要求与资方谈判薪酬,至全所实行罢工,当时高梦旦出为资方谈判代表,其女婿郑振铎却是“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翁婿二人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会下却依然相敬如常。

高梦旦精于守成,又眼光开放,这就是他游说胡适加盟的伯乐识千里马的例子了。其时作为“商务”编译所的所长,高梦旦已是50多岁的人了,胡适是而立之年的留美博士,当时高梦旦数次劝胡适辞去北大教职,出任商务



高梦旦

印书馆编辑部主任。他对胡适说:“我们那边缺少一个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眼睛”?高梦旦在一封信中透露了其缘由:“弟生平不作白话文,而对于白话文并不反对,盖知非此不能普及也。……此回编辑教科用书,本以普及教育为职志,故不能不注重白话文,以期养成多数国民之智识,而弟既不能白话文,势不足应时势之需要,颇愿求人,有人盛称胡氏之为人,初不敢轻信,因与之往返,委托托其校阅稿件,相知既久,相信较深,愿招致来沪,引以自代。”高梦旦还诚恳地对胡适说:“北大固然重要,我们总希望你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事业。”当然,要在北大和

“商务”之间做一个选择,这让胡适犯了愁:“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的机关,当然比北大重要多了”,其实岂止几千万儿童,“商务”的影响面实在在几十个北大之上,胡适犹豫自己的才干是否足能当大用,又见高梦旦的诚挚,便答应可以去试试。你想想呵,彼时以高梦旦的身份去亲自拜访一个“海龟”的青年,这事是很少见的,却可以想见“商务”成功的一个秘诀,同是曾受到高梦旦降贵尊荣过访的郭沫若惊呼那是“异数的光降,就好像汉光武访问于严子陵,或者是像亚力山大王访问皮匠,把编辑所里的人都震惊了”。(《创造十年》)果然,高梦旦意外的过访,竟使上海光华书局老板赵南公惊惶不已,他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眼睛”?高梦旦在一封信中透露了其缘由:“弟生平不作白话文,而对于白话文并不反对,盖知非此不能普及也。……此回编辑教科用书,本以普及教育为职志,故不能不注重白话文,以期养成多数国民之智识,而弟既不能白话文,势不足应时势之需要,颇愿求人,有人盛称胡氏之为人,初不敢轻信,因与之往返,委托托其校阅稿件,相知既久,相信较深,愿招致来沪,引以自代。”高梦旦还诚恳地对胡适说:“北大固然重要,我们总希望你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事业。”当然,要在北大和

但却派了一名实习生从图书馆借出一整套林译小说,逐字重新核算,果然漏算字数超过了10万,于是补算给林译南大洋600余元。高梦旦宅心仁厚,“他爱敬张菊生先生就如同爱敬他的两个哥哥一样,又见高梦旦的诚挚,便答应可以去试试。你想想呵,彼时以高梦旦的身份去亲自拜访一个“海龟”的青年,这事是很少见的,却可以想见“商务”成功的一个秘诀,同是曾受到高梦旦降贵尊荣过访的郭沫若惊呼那是“异数的光降,就好像汉光武访问于严子陵,或者是像亚力山大王访问皮匠,把编辑所里的人都震惊了”。(《创造十年》)果然,高梦旦意外的过访,竟使上海光华书局老板赵南公惊惶不已,他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眼睛”?高梦旦在一封信中透露了其缘由:“弟生平不作白话文,而对于白话文并不反对,盖知非此不能普及也。……此回编辑教科用书,本以普及教育为职志,故不能不注重白话文,以期养成多数国民之智识,而弟既不能白话文,势不足应时势之需要,颇愿求人,有人盛称胡氏之为人,初不敢轻信,因与之往返,委托托其校阅稿件,相知既久,相信较深,愿招致来沪,引以自代。”高梦旦还诚恳地对胡适说:“北大固然重要,我们总希望你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事业。”当然,要在北大和

高梦旦死于1936年,当时“政治不上轨道”,《生活》杂志本来言论平实,竟被禁止邮寄。国家如此,高梦旦还提升文艺青年沈雁冰担任《小说月刊》的主编,当时沈非常“气粗”,竟向高梦旦提出三条苛刻的要求:一是现存稿件都不能用;二是印刷字体全部改用五号字;三是馆方应当让其全权办事,不能干涉编辑方针,怎么样?高梦旦全部应允了。对可自代者。有人盛称胡氏之为人,初不敢轻信,因与之往返,委托托其校阅稿件,相知既久,相信较深,愿招致来沪,引以自代。”高梦旦还诚恳地对胡适说:“北大固然重要,我们总希望你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事业。”当然,要在北大和

《政学先生》
李村 著
2015年11月出版 38.00元

该书聚焦现代史上“政学”交集之处,贯穿中国传统“文人政治”视野,颇具敏锐之问题意识。这部随笔集中的二十五篇文章有些谈“政先生”,有些谈“学先生”,在丰富、细致的史料支撑的基础上,强调知识人在社会流变中的独立性,书中也不乏对试图参与政治的知识人两难困境的分析、讽喻、批评和一定的同情理解。其中谈胡适的文章依然不少,但主要聚焦于他离开大陆后的经历,也是作者对胡适问题的总结。

《蛛丝马迹:犯罪现场专家讲述的故事》
[美]康妮·弗莱彻 著,毕小青 译
2015年11月出版 42.00元

作者感慨于美剧《犯罪现场调查》脱离事实,访谈了全美80多位司法证据学专家,包括犯罪现场证据专家、DNA分析员、隐微印痕专家得到了大量事实而中肯的经验:如何复原犯罪现场?如何寻找尸体上的证据?DNA证据如何替受害者说话?司法证据专家如何做好出庭准备?通过调查真实的“犯罪现场调查”,作者还发现与美剧那些阴沉着脸、居高临下的家伙完全不同,成功的侦探们都极具社交能力,和蔼可亲,很幽默。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